

金泓汎 董玉洪 林 冈 著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台湾的政治转型

—从蒋经国体制到李登辉体制

台湾的政治转型

——从蒋经国体制到李登辉体制

金泓汎 董玉洪 林 冈 著

序 言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因 1949 年国民党退踞台湾，仍以“中华民国”名义统治台湾，造成了与大陆暂时分离的局面。战后，台湾的政治是以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主要特征的专制政治。只是在蒋经国主政的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去世后，才适应台湾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开始转向民主政治。为了研究台湾政治的这一转型过程，我们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曾以“后蒋经国时期的台湾政治”为题进行了研究。此项研究本于 1991 年基本结束并写出本书的初稿，后因我赴日进行客座研究近二年，拖延至今才修改定稿。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台湾政治转型的特征，主要是指出政治转型的概念，分析政治转型的原因，探讨政治转型的过程及社会矛盾，展望政治转型的前景。第二部分为台湾的政党政治，着重探讨台湾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政党政治与执政党的地位，政党政治与在野党的作用机制，还分析和批判了与政党政治有联系的“台独”组织及其理论和活动。第三部分为台湾的民主政治，系统地介绍和探讨了民主政治与台湾的“中央”权力体系、地方自治及民众参与政治等诸问题。第四部分为台湾的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主要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观念及其作用，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台独”势力和“独台”势力与两岸关系，国共两党的统一方案及其特征等。

政治一般以国家为主体，台湾并不是一个国家，本不应存在国家型政治制度和体制，只因国民党仍保存和发展“中华民国”的原有政治制度和体制，才存在上述一系列政治范畴。本

书只是为了研究仍按台湾的现行政治制度和体制进行分析和探讨，这并非意味着作者承认其合法性和合理性。

本书的第一、九章由金泓汎撰写，第二、三、四、五章由董玉洪撰写，第六、七、八章由林冈撰写，由金泓汎补充修改和统纂定稿。课题组成立之后，林冈赴美进行客座研究和攻读博士学位，在繁忙的研究和学习中仍按时提供了研究成果，对此深表谢意。但因时隔几年后才定稿，在这一期间台湾的政治又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因林冈仍在美国难以亲自补充修改，只好由我统一补充修改。目前在祖国大陆系统地论述台湾政治的专著甚少，我们撰写此书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但实属一次力不从心的尝试，因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初稿，曾作为“七·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经知名政治学或台湾问题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中国社科院台湾所研究员李家泉、王科华、厦门大学台湾所教授朱天顺等诸位鉴定，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9月补充于福建社会科学院

金泓汎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台湾政治转型期的特征	(1)
第一节 台湾的政治转型期	(1)
第二节 台湾政治转型的经济基础	(5)
第三节 台湾政治转型的过程	(11)
第四节 台湾政治转型期的社会矛盾	(23)
第五节 台湾政治转型的主要特征	(31)
第六节 台湾政治转型的前景	(36)
第二章 台湾的政党政治	(43)
第一节 台湾政党政治产生的背景	(43)
第二节 台湾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	(54)
第三节 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	(67)
第三章 政党政治与执政党	(84)
第一节 政党政治与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84)
第二节 政党政治与国民党的“党务革新”	(91)
第三节 “党务革新”与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变化	(111)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与在野党	(126)
第一节 政党政治与在野党的作用机制	(126)
第二节 在野党的类型及其政治诉求的主要特征	(136)
第三节 在野党的政治纲领	(142)

第四节	政党竞争格局及在野党的内部关系·····	(156)
第五章	政党政治与“台独”势力·····	(171)
第一节	“台独”势力的社会基础及理论主张·····	(171)
第二节	“台独”势力猖獗的背景·····	(185)
第三节	现阶段“台独”势力活动的特点·····	(197)
第六章	民主政治与“中央”权力体系·····	(213)
第一节	“宪政改革”与“中央”权力体系·····	(213)
第二节	“中央”权力体系中的行政系统·····	(228)
第三节	“中央”权力体系中的议会与司法系统·····	(242)
第七章	转型期的地方自治·····	(266)
第一节	地方自治的法源问题·····	(267)
第二节	地方自治的权限·····	(274)
第三节	地方自治与行政区域的重划·····	(281)
第四节	地方自治与地方选举·····	(286)
第五节	地方自治与地方派系·····	(294)
第八章	转型期的大众政治参与·····	(301)
第一节	利益团体与政治参与·····	(301)
第二节	大众传播与政治参与·····	(308)
第三节	选举政治与政治参与·····	(314)
第四节	街头运动·····	(323)
第九章	转型期的两岸关系·····	(331)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与两岸关系·····	(331)
第二节	美国因素与两岸关系·····	(338)
第三节	“台独”势力与两岸关系·····	(347)
第四节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	(357)
第五节	“一国两制”构想与两岸关系·····	(366)

第一章 台湾政治转型期的特征

近来，转型期的概念颇为流行。尤其是在台湾，转型期被广泛用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研究“后蒋经国时期”的台湾政治，首先要探讨转型期的台湾政治。

第一节 台湾的政治转型期

一种新概念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是某种现象特别是某种规律性现象累积的结果，是人们对这种规律性现象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表现，有其事实基础和理论依据。也许人们以为转型期不过是学人们用来赶时髦的一种词汇，其实不然。在台湾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政治上的许多现象，确实是属于转型现象，有必要作科学的概括和界定。为此，一些学者试图建立自己的概念和体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三种：大陆学者李水旺认为，“所谓‘转型’意指调整、过渡，是指政治上具有重大阶段性意义的结构变化。”^[1]日本学者若林正文在《台湾——转型期的政治与经济》一书中，使用“转换”、“移行”的概念，指出这是“从一种政治体制到另一种政治体制之间的间隙，它始于权威主义体制开始崩溃，终于建立某种民主政治体制，或回归到另一种形态的权威主义体制，或革命性行为的出现。”^[2]美国学者田弘茂利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ITION）的概念，探讨台湾的政治转型，指出这种转型是从权威主义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3]综上所述，尽管这些学者的概念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将台湾政治的发展视为一个

变化过程，从动态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包含转移、转变、过渡等内涵的政治转型概念，这是基本上符合台湾的政治现实和视政治为变化过程的政治认识论发展趋势的。

如同其他事物一样，政治也是在运动中发展。从动态和过程的角度言，政治也是一种运动。它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政治的功能分析，台湾的政治机构如“国大”、“五院”等的功能，是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实现，而实际政治活动就是实现政治功能的运动过程。从政治的行为分析，“国大”、“五院”等政治机构的活动，实际上都是有关政党、领袖、利益团体或群众，以其思想倾向、行为模式、心理需求等为内容，从事政治行为的运动过程。因此，无论是政治的功能，还是政治的行为，都在运动中呈现为政治变化过程。用这一理论分析台湾的政治转型期，至少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探讨，即一是转型的内容，二是转型的期限。台湾政治转型的内容，国内外学者众说纷云，但可概括出倾向性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这一转型内容的具体表述有几种，外国学者多称为从权威主义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台湾学者认为是从威权主义政治到民主政治或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大陆学者多定义为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渡，或从“一党专政”到政党政治的过渡。从这些表述可知，除表述语文和文字上的差别如权威主义和威权主义、同一范畴的概念重复如政党政治包括在广义的民主政治中等之外，就本质而言并无根本差别，因此可用通俗而规范化语文，将台湾政治转型期的转变内容概括为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变，即与过去的国民党专制统治诀别，逐步走上民主化道路的过程。这一政治转型内容，具有出发点一致而目的和结果可能不同的特点。所谓出发点一致，是指台湾的政治转型都以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专制政治为出发点，这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台湾朝野一致认同的基础。

但是，政治转型的目的因各政党和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或政见有异而有很大的差别。执政的国民党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维持对台湾的统治，主张“体制内”的改革，在不根本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条件下，通过“宪政改革”，逐步实现民主政治。反对党尤其是民进党则为取得统治权，主张“体制外”的改革，力图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以民进党为执政党和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治体制，并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些不同的转型目的，随着台湾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力量的重组，还可能出现偏离本来目的的结果。

至于台湾的政治转型期需要多长时间，是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一方面政治转型的期限取决于转型目的的实现程度，而转型目的实现程度又取决于对转型的要求和实现转型的途径及变化中的内外环境，不确定因素甚多，难有确切的时间表。另一方面政治转型的期限本身不易用非常准确的时点表示，只能以代表一定长度的时间概念表示。为此，试想将政治发展过程划分为时代、时期、阶段三个时间概念，探讨台湾政治转型的期限。用时代的时间概念探讨政治发展过程已是人们所共知的事实，这一方面的论著也时有所见。大陆学者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一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政治时代”，指出现今“人类处在政治时代”，他所指的这个“政治时代”是整个20世纪。^[4]用时期的时间概念研究政治发展的也不乏其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政治上的过渡时期”^[5]概念，研究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我国在建国初期也曾提出过“过渡时期”的时间概念。这里所指的“过渡时期”，其时间长短不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的“过渡时期”时间较长，我国在建国初期提出的“过渡时期”时间较短。也有人用阶段这个时间概念探讨政治发展过程。王沪宁在两个意义上使用阶段的概念，一是在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他写道：“西方

社会有过一段漫长的神学时代，然后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制。在这个阶段中，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体系，出现封建割据和贵族君主政制。”^[6]在此，作者将神学时代和君主政制时代共称为一个阶段，显然是跨时代的。二是在时代的意义上使用，他指出“在政治体系的发展历史中，有过一段极端的封闭阶段。封建专制君主政制便是政治过程封闭性的典型。”^[7]在这里，作者所指的阶段只是指封建专制君主政制时代，即与时代相同。由此可见，不同学者甚至同一学者，在使用时代、时期、阶段等时间概念时，尚无规范化的统一用法。为了用科学的时间概念探讨台湾政治转型期的期限，在此有必要统一时间概念，要对上述时代、时期、阶段界定一个时间长度。考虑到在此所探讨的台湾政治主要是“后蒋经国时期”的政治，尤其是现阶段的政治变化，为了本书确定的特定目的，可将上述时代的时间长度界定为 50 年到百年左右，时期的时间长度界定为数十年，阶段的时间长度界定为 10 余年。据此考察二战后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时，可将其分为两个时期即“蒋家统治时期”和“后蒋家统治时期”，现正处在从“蒋家统治时期”到“后蒋家统治时期”的转变时期。这一转型期将经过酝酿、实施、完成三个阶段，实现相应的转变。台湾的政治转型期经过 70 年代的酝酿阶段，80 年代中期进入实施阶段，将于本世纪末转向完成阶段，大约需要 30—50 年的时间。这一分析和预测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实践将证明台湾的政治转型需要较长的时间。目前，对台湾的转型期有“分阶段论”和“无阶段论”两种见解，有的学者将台湾的政治转型期界定在 80 年代中期以后，^[8]而且不分转型的阶段。然而，在事物的发展中，很少有突如其来的变化，任何现象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台湾的政治转型期也必然会有酝酿、实施、完成等阶段。所谓台湾的政治转型期始于 80 年代中期，只能是指这一

转型的实施阶段的起步而不是开始。概括而言，台湾的政治转型期是经过数十年时间，从专制政治逐步转变为民主政治的一个过渡时期。

第二节 台湾政治转型的经济基础

一般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决定于经济，同时又对经济起反作用。即使是西方政治学家也不否认这一点，“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9]因此台湾政治转型的导因，应从经济转型中寻找。

一、经济发展与角色转换

40余年来，台湾虽在戒严体制下实行专制政治，但其经济发展令人注目，不到50年时间里，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之一。这种经济“奇迹”与专制政治似乎有矛盾，即一般政治越民主经济也越发达，而台湾是在实行专制政治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起飞。故英国《经济学家》将亚洲“四小龙”作为一种例外。为解释这一现象，可借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战略，作一些粗略的探讨。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人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政治战略分为“民主的平民主义战略”、“独裁——技术型战略”、“独裁——技术——平等型战略”和“独裁——技术——动员型战略”等几种，并视台湾为实行“独裁——技术——动员型战略”的国家或地区之一。他们认为，这一战略的特征是实行分配性的经济政策，维持秩序和促进经济增长，而台湾实行的是一种“先占型”的动员体系。^[10]这一分析类似于台湾实行开发型独裁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台湾的情况。可以认为台湾当局以“反共复国”为理由实行“动员型”经济政策，将经济

资源集中于经济增长上，以专制统治保证其经济顺利发展，实现快速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发展也必然逐步引发官营资本与民营资本、大陆籍资本与台湾籍资本之间的利益调整及角色转换。

首先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角色调整。公营经济是台湾当局控制经济命脉，实行“一党专政”的物质基础，主要由台湾光复后没收的日本资本和大陆迁台部分官僚资本组成。在台湾当局的特殊安排下，公营经济经营有关“国防”工业、垄断性公共事业、关系公共福利而民间不易举办的工业，以及关系经济命脉的工业等。几十年来，它控制台湾的交通运输、能源、基干产业和金融等重要经济资源，靠台湾当局的特定政策和特权性金融扶持迅速膨胀起来，主导了台湾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内外环境的改变，公营经济的主导作用发生变化，其经济地位逆转，由 50 年代占台湾资产总值 60%^[11]、占台湾工矿业产值一半以上^[12]，转变为 1985 年占台湾资产总值的约 25% 和工矿业产值的 15%，民营经济迅速成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一经济现象反映，台湾专制政治的物质基础大为削弱，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迅速壮大，并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发生矛盾。代表民营经济利益的政治势力逐渐成长，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实行公平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促进台湾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台湾籍资本迅速膨胀，成为台湾地方势力的经济基础。若说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角色转换反映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日益壮大，那么台湾籍资本的迅速膨胀则反映台湾地方势力的经济基础迅速扩大。几十年来，台湾的民营经济以台湾籍资本为主迅速发展，这可从三个方面说明：一是私人资本的形成以台湾籍资本为基础。台湾的私人资本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即从日据时期遗留下来的台湾籍资本，光复后台湾当局出售原日资企业而形成的台湾籍资本，在土地改革中通过购买“四大公司”股票由土地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的台湾籍资本及迁台大陆私人资本。显然，前三种台湾籍资本在民营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二是台湾的财团资本主要由台湾籍资本构成。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的台湾财团资本，拥有100家左右下辖700多家分子企业的集团企业，其中约70%属于台湾籍资本。三是占台湾企业数98%以上的中小企业更是以台湾籍资本为主体。由上可见，从资本的形成到发展，从财团企业到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基本上由台湾籍资本推动，促使台湾地方势力逐渐壮大，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大陆籍资本与台湾籍资本等各种经济力量的对比，向有利于民营经济和台湾籍资本的方向发展。（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力量对比变化，一方面向台湾当局的专制政治提出挑战。要求重新分配政治资源，建立有利于民营经济和台湾籍资本顺利发展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培育出代表民营经济和台湾籍资本的政治势力和政治精英，支持他们进入台湾的政治领域。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和台湾籍资本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民主政治发展的物质条件。）

二、角色转换与中产阶级的出现

界定经济为政治的基础，并不是说经济力量的对比变化自然而然地带动政治结构或体制的变化，而是指经济发展培育出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通过其有意识的政治参与，改变现行政治结构或体制，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台湾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营经济和台湾籍资本迅速发展的上述现象，必然促使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出现，并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较量。台湾属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容

置疑，其主导阶级是资产阶级，台湾当局就是其阶级利益的主要代表。与此相对立的阶级是劳工阶级，但因劳工阶级尚未壮大，中产阶级成为促进生产力的主要代表，其经济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于中产阶级，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日本学者刘进庆教授认为，“所谓中产阶级，顾名思义是指处在阶级利益相对立的统治阶级与下层之间的诸阶层。”^[13]有的台湾学者则“把具有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从事非体力劳动，总收入在国民收入“五分位法”中的第四位到第二位者划为中产阶级。”^[14]大陆学者认为，“台湾中产阶级属资产阶级范畴，是中小资本拥有者，故把台湾中小企业主划为中产阶级，让他代表台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中小资本所有者”。^[15]对中产阶级的这些不同定义，出自不同的阶级划分标准。日本和台湾的学者多按韦伯等西方政治学家的“三维”标准，即根据财富、声望和权力划分中产阶级，而大陆学者则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显然，从严格的阶级意义上说，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标准划分中产阶级较为合理。但台湾的中产阶级是否就是中小企业主，倒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一定义排除了一部分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自由职业者等，导致中产阶级的范围偏小。故将中小企业主加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自由职业者划分为中产阶级可能更为妥当。由于中产阶级的定义有异，其数量也有多种统计，日本学者刘进庆和台湾学者肖新煌估计，台湾的中产阶级占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约为260万人^[16]，大陆学者潘晋明估计约33万人^[17]，两者相差甚大。从数量上看，潘晋明的定义显然过窄。这一定义会引出一个问题，即30多万中产阶级怎能成为推动今日台湾政治转型的中坚力量？可见，无论是从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都有必要适当放宽中产阶级的定义。上述由中小企业主加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自由职业者组成中产阶级的概念，有利于解决

这个问题。台湾学者使用中产阶级的概念比这一定义还宽，实际上他们所讲的中产阶级是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中间阶层。日本学者刘进庆教授在探讨中产阶级特征时认为，“就概念而言，并不存在单一的中产阶级，而是存在多数非基本阶级或阶层，其共同特点就是不具有统一的标准”。^[18]可见外国学者及台湾学者是将中产阶级等同于中间阶级。台湾民众更是任意扩大中产阶级的概念，导致中产阶级的数量又过大。“台湾研考会”1981年所做的第五次现代化调查显示，台湾地区有56%以上的民众主观上自认为是中产阶层。^[19]因此，有必要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两个角度探讨台湾的中产阶级问题。一方面，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界定中产阶级的属性，视其为中间阶层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从所得分析的角度，以收入“五分位法”的中等所得者为中间阶层，视其为中产阶级的外围力量。根据不同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以利于既从学术和科学意义上，也从习惯意义上分析台湾中产阶级及其地位和作用。

台湾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主要取决于中小企业的地位，中产阶级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自由职业者，其经济实力难与庞大的中小企业相比。台湾学者惯用的一些所谓中产阶级虽有一定规模的经济收入，但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再分配收入。因此主要是中小企业在促进生产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的意义上体现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台湾中小企业只有70余万家，占企业家数的98%以上，所雇员工500多万人，占就业人口的70%，拥有的资产约占全台官民营企业资产总额的58%，产值600多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以上”。^[20]足见，台湾中小企业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显著，是台湾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然而，台湾的中小企业有致命的弱点，一是整体上强大而个体上脆弱，使其

经济地位和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上述中小企业的整体经济实力，是由 70 余万家中小企业构成的，其规模十分庞大，但就个体中小企业而论，其经济规模则甚小，平均每家企业的员工数仅 7 人左右，产值也只有 8 万多美元，在生产经济活动中又缺乏自身的联结能力，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体系。二是台湾的中小企业对国营企业、私人财团企业和外资企业有一定的依附性。上述个体上的脆弱性，导致这些中小企业又在产供销活动上往往为国营企业、私人财团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左右，受其一定控制，难以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经济力量。因而就政治转型的经济基础而言，与其说台湾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取决于中小企业整体经济的规模及其扩张力本身，还不如说取决于这种规模及扩张力因受台湾当局垄断性资源分配和不公平财富分配而产生的对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挑战力。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产阶级对台湾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挑战，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其行动的指导力量，所谓中产阶级意识就是台湾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其经济或物质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台湾的中产阶级意识，因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各异而称谓和内涵均有所不同。日本学者刘进庆教授将中产阶级意识称为“中流意识”，并指出“所谓中流意识是指在大众消费社会中，从消费者的共性出发，认为自己阶级归属意识的中间诸阶层的意识形态。”^[21]显然，这是以所得分配为标志进行的定义，有一定的片面性。从另一角度定义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就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标志，认识自己阶级归属关系的意识形态，就此而言，与统治阶级的保守意识和劳工阶级的革命意识相比，中产阶级的意识属于改良意识的范畴。在台湾，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广泛性，使这一意识形态超越中产阶级的范围，甚至也超越中间阶层的范围，成为代表台湾中下层和中上层民众的一种意识形态。日

本学者刘进庆教授用“肥大化”概念探讨这一现象，认为台湾的中流意识以中产阶级意识为基础包括低所得层中的中高层人及高所得层的中下层人的意识形态，并定义为“就狭义意义而言，中流意识以中产阶级为基础，而就广义意义而言，则由广泛而多种中间诸阶层形成。”^[22]这一中产阶级意识，提倡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多元，是对台湾当局经济垄断、政治独裁、社会一元的一种反动或修正，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思想基础。

不论是台湾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为其政治发展服务的，但因台湾的中产阶级未能走上政治舞台，其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只能成为一种潜在的资源。台湾的中产阶级正是为了使这一潜在资源变为现实资源，开始进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在台湾当局的专制统治下，30多年来，政治资源被国民党所垄断，对拥有很大经济实力和改革意识的中产阶级实行专制统治。因此，以中产阶级为阶级基础，改革意识为思想武器的政治势力，在台湾当局的戒严体制下，仍增强参政意识，通过非法途径逐步登上政治舞台。并冲破“报禁”、“党禁”，走上组党的道路，以政党或联盟的形式，进一步增强力量，强烈表达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但因经济上依附于公营经济，政治上往往与台湾当局妥协，加之其改良性意识形态又受分离意识的影响，不太可能真正带领台湾民众，与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只能在台湾当局的一定让步和中间阶层及台湾民众的有限支持下，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节 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

台湾的政治转型有个过程，大体分为酝酿、实施、完成三